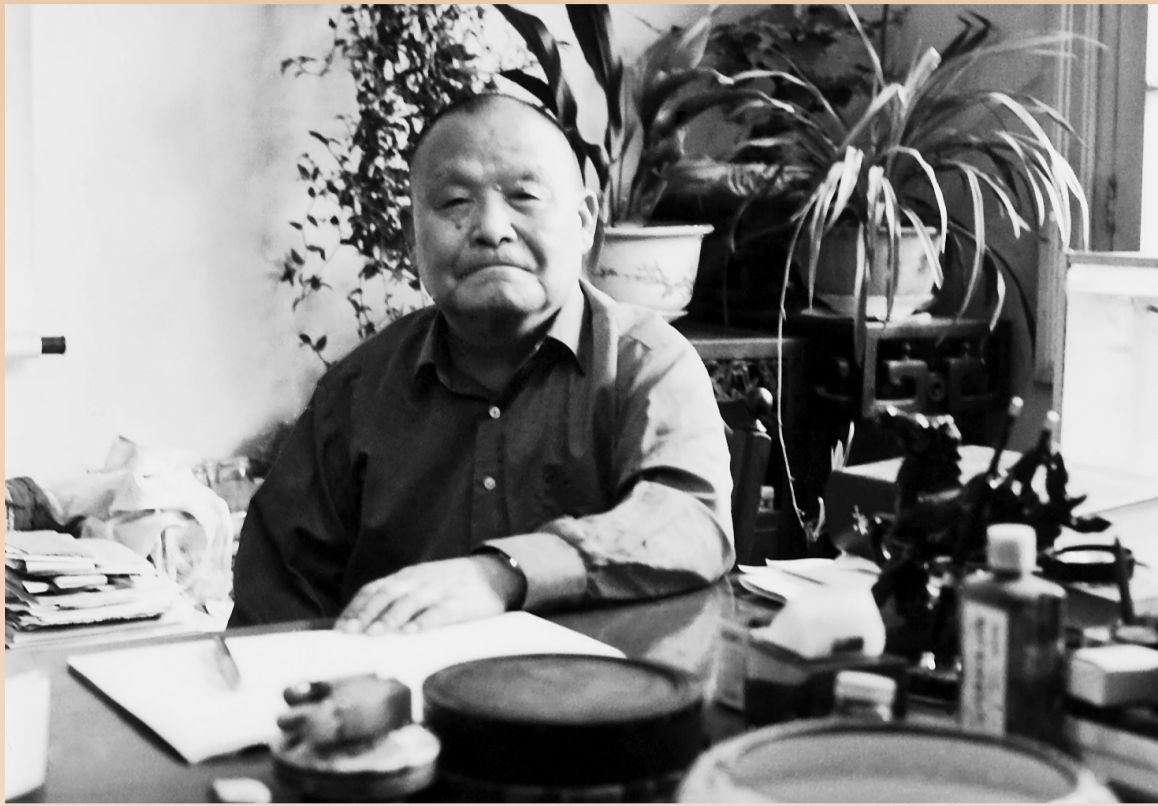


经典作家



梁斌,生于1914年4月18日,河北蠡县梁家庄人,毕业于保定第二师范学校,原名梁维周,笔名雨花、梁文彬。著名小说家、国画家、书法家。代表作品包括《红旗谱》《播火记》《烽烟图》等,其中《红旗谱》先后被改编为话剧、电影、评剧、京剧、电视剧等,深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。今年是梁斌先生诞辰110周年,本报特邀阎浩岗、刘卫东、宋安娜三位专家学者撰文,以此纪念这位中国当代文学大家。

——编者

纪念

梁斌

诞辰一百二十周年



十月廿五日伟大的早晨 梁斌作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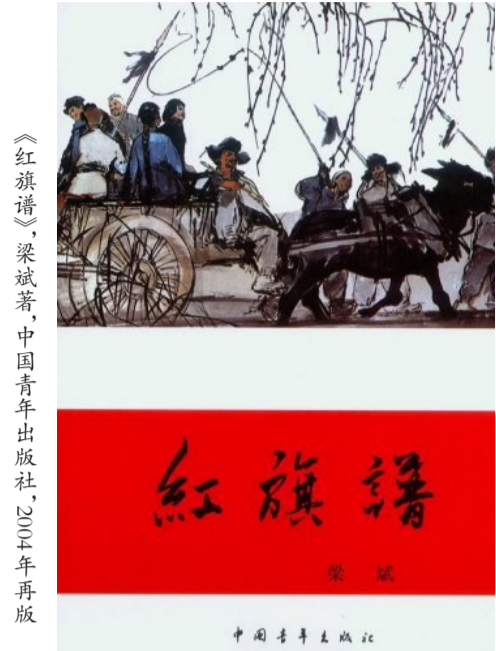
《红旗谱》(1960)电影剧照



纪念陈庄战斗五十五周年 梁斌作

《红旗谱》《播火记》:文学史上绕不过的存在

□阎浩岗



《红旗谱》,梁斌著,中国青年出版社,1957年再版



《播火记》,梁斌著,中国青年出版社,1957年初版

1957年至1958年之交,《红旗谱》如平地一声雷,震动了中国文坛;5年后,《播火记》又从北方平原刮起红色风暴。于是乎,梁斌从一个普通的革命干部,一跃成为闻名全国、享誉海外、青史留名的大作家。长篇小说出版不久,报刊上铺天盖地的介绍、评论或转载,话剧、电影、戏曲、曲艺和连环画等对原作的改编与普及,及其他“红色经典”都享有的待遇;但像《红旗谱》《播火记》这样被郭沫若、茅盾和周扬等名家都予以重视、给予高度评价的,恐怕就不太多了。郭沫若亲自为两部小说题写书名,茅盾称其为“里程碑的作品”,周扬则誉之为“世界一流”。即使“文革”时期,《红旗谱》《播火记》仍然保持这热度。新时期初期拨乱反正,《红旗谱》在各种版本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中占据突出位置。1980年代中期以后,虽然在“重写文学史”浪潮中“十七年”文学普遍被看低,但《红旗谱》在绝大部分的文学史书写中并未消失。1997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王蒙主编《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—1976·小说卷》中,《红旗谱》位列收录的五部长篇之一。新世纪各种评论历史小说的论著,每以《红旗谱》为参照,也许今天的读者阅读感受可能会有不同,但《红旗谱》一直是文学史上绕不过的存在。

《红旗谱》的文学史地位,取决于其独特的艺术性。该书塑造的朱老忠形象,是文学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人物类型,古代文学大多以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为主人公,即使号称“农民革命的史诗”的《水浒传》,除了面容模糊的陶宗旺,书中主要人物也没有一个是自幼为生的地道农民。在《红旗谱》之前,中国现代小说中出现了鲁迅笔下的闰土,华盖笔下的老罗伯和罗大,茅盾笔下的老通宝和多多,王统照笔下的二叔和奚大,赵树理笔下的小二黑、李有才、张铁锤、王金生、周立波笔下的赵玉林、郭全海、刘雨生等农民形象,而朱老忠与这些农民迥然不同:他不是一个被同情、被怜悯的“受害者”,而是富有个人魅力的强者;他有普通农民身上不具备的江湖气、侠骨气,确实是一个平日里能屈能伸、过江履日子的地道农民;他不是完全由外力推动的被动反抗者,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活出人格精神的韧性战士,一个真正的“主体”,一个兼具真正农民身份与平凡英雄气质的“卡里斯马”。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主要是土地革命、农民革命,如果没有《红旗谱》和朱老忠,中国文学的革命叙事中就只剩下“被解放”的农民,而没有主动寻求自我解放的农民,文学对农民革命性的揭示就不深刻、不充分,停留在“阿Q式革命”阶段。事实上,实际的革命斗争中涌现的农民英雄既有阿Q式赵玉林、郭全海式,也不乏朱老忠式,即出身农民却又在一定程度超越了普通农民的类型。这样的农民,往往是生活中更常见的严志和、朱老忠、伍老茂式的农民领导者,他们最终会成为出色的农民领袖乃至革命干部。

《红旗谱》《播火记》以乡村的小户与大户(即农民与地主)之间的矛盾冲突为基本情节线索和叙事发展动力,它在写接受党领导之前的斗争时,突出了农民之间靠友情与义而产生的团结协作精神——



梁斌年轻时候的照片(1960年)

梁斌的代表作是出版于1957年的《红旗谱》。对梁斌不熟悉的读者可能会认为,梁斌属于新中国中国成立后“革命历史叙事”中一举成名的作家。其实不然,梁斌的创作始于1930年中期。1932年7月,梁斌参加就读的保定第二师范学校的学潮运动,学潮失败后,保二师被解散。因为上了“共主义思想犯”的嫌疑黑名单,梁斌离开家乡,跑到北平,加入“左联”,以笔为武器,继续战斗。当时他与学潮中的二师朋友一起,白天到北平图书馆(现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,北京图书馆前身)自学,晚上写作,投稿,在平津报刊上发表了许多作品。此后,梁斌参加抗日,南下湖北开辟敌区。1950年代初期,梁斌开始撰写《红旗谱》,并因此轰动文坛。此时,早期作品对于梁斌来说,是价值不大的“练笔”,并没有很大关心。可以说,梁斌1930年代中期的作品自发表后,就隐没在文学史深处,长时间内默默无闻。

直到1980年代年初,这批作品才得以走出故纸堆。当时,河北师范大学的青年教师曹文斌因为编写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·梁斌专集》,发现了10多篇梁斌青年时代的作品。梁斌写了关于早期的几篇作品(《魁池》1981年),详细记录了这批作品写作、发表情

老一輩的朱老忠挑战冯兰池,有好友严老祥一家协助;朱老忠返乡前,由朱老明牵头,严志和与朱老盟、伍老拔参与,共同与冯兰池打官司;朱老忠返乡后,他们又团结在朱老忠周围,有难同当,有了这样的人际关系基础,贾湘农开锁并锁“捕火”就没费太多周折。小说写到朱老忠等接受党的领导之后,没有像“十七年”时期一开始就写成直截对垒、剑拔弩张那样将双方斗争一开始就写成直截对垒,剑拔弩张:第一部的“脯红鸟事件”完全是普通的乡里纠纷;冯兰池喜欢那只鸟,但并不强迫夺取,而是想高价购买;朱大贵不卖,他也无可奈何,他报复朱家,用的是“合法”的抓丁手段,“反梢剥头”则是在地下党暗中领导通过不流土匪手段取得的胜利,可以说《红旗谱》写的农民与地主的阶级斗争,但这种阶级斗争之所以写得自然又富于张力,是因为它借助家族冲突方式而展开。小说中参加朱老忠一派的,是锁井镇和小严村最讲义气、最敢斗争的人,而非最穷的人——朱老忠和严志和应该属中农或下中农,与他们家庭条件差不多的老驴头,比他们穿得多的福农老套子就没有加入。也并非所有地主都与冯兰池联合在一起,与朱老严对垒,相反,锁井镇另外两家地主冯老猫、冯老洪与冯兰池是仇人,冯兰池所以霸道,主要不是因为他的财富,而是因为 he 掌握了村长和堪舆的乡村基层权力。据梁斌自述,民国时期冀中乡村的贫富分化并不特别明显,华北虽有地下党,但没有像南方那样建成根据地。这应该与当时北方农村的特殊社会形势不开,《红旗谱》和《播火记》真实揭示了北方乡村革命的特殊性。

塑造这样的人、讲述这样的故事,《红旗谱》用的是不一样的写法,即以日常性为基调,添加适度的传奇色彩。第一部完全是日常生活叙事,即使第二部写高嵩暴动和武装斗争,其写法也迥然有别于《敌后武工队》《铁道游击队》《烈火金刚》《林海雪原》之类

革命通俗传奇,《播火记》中参加暴动的农民起义军领导人,伍老拔参与,共同与冯兰池打官司;朱老忠返乡后,他们又团结在朱老忠周围,有难同当,有了这样的人际关系基础,贾湘农开锁并锁“捕火”就没费太多周折。小说写到朱老忠等接受党的领导之后,没有像“十七年”时期一开始就写成直截对垒、剑拔弩张那样将双方斗争一开始就写成直截对垒,剑拔弩张:第一部的“脯红鸟事件”完全是普通的乡里纠纷;冯兰池喜欢那只鸟,但并不强迫夺取,而是想高价购买;朱大贵不卖,他也无可奈何,他报复朱家,用的是“合法”的抓丁手段,“反梢剥头”则是在地下党暗中领导通过不流土匪手段取得的胜利,可以说《红旗谱》写的农民与地主的阶级斗争,但这种阶级斗争之所以写得自然又富于张力,是因为它借助家族冲突方式而展开。小说中参加朱老忠一派的,是锁井镇和小严村最讲义气、最敢斗争的人,而非最穷的人——朱老忠和严志和应该属中农或下中农,与他们家庭条件差不多的老驴头,比他们穿得多的福农老套子就没有加入。也并非所有地主都与冯兰池联合在一起,与朱老严对垒,相反,锁井镇另外两家地主冯老猫、冯老洪与冯兰池是仇人,冯兰池所以霸道,主要不是因为他的财富,而是因为 he 掌握了村长和堪舆的乡村基层权力。据梁斌自述,民国时期冀中乡村的贫富分化并不特别明显,华北虽有地下党,但没有像南方那样建成根据地。这应该与当时北方农村的特殊社会形势不开,《红旗谱》和《播火记》真实揭示了北方乡村革命的特殊性。

革命通俗传奇,《播火记》中参加暴动的农民起义军领导人,伍老拔参与,共同与冯兰池打官司;朱老忠返乡后,他们又团结在朱老忠周围,有难同当,有了这样的人际关系基础,贾湘农开锁并锁“捕火”就没费太多周折。小说写到朱老忠等接受党的领导之后,没有像“十七年”时期一开始就写成直截对垒、剑拔弩张那样将双方斗争一开始就写成直截对垒,剑拔弩张:第一部的“脯红鸟事件”完全是普通的乡里纠纷;冯兰池喜欢那只鸟,但并不强迫夺取,而是想高价购买;朱大贵不卖,他也无可奈何,他报复朱家,用的是“合法”的抓丁手段,“反梢剥头”则是在地下党暗中领导通过不流土匪手段取得的胜利,可以说《红旗谱》写的农民与地主的阶级斗争,但这种阶级斗争之所以写得自然又富于张力,是因为它借助家族冲突方式而展开。小说中参加朱老忠一派的,是锁井镇和小严村最讲义气、最敢斗争的人,而非最穷的人——朱老忠和严志和应该属中农或下中农,与他们家庭条件差不多的老驴头,比他们穿得多的福农老套子就没有加入。也并非所有地主都与冯兰池联合在一起,与朱老严对垒,相反,锁井镇另外两家地主冯老猫、冯老洪与冯兰池是仇人,冯兰池所以霸道,主要不是因为他的财富,而是因为 he 掌握了村长和堪舆的乡村基层权力。据梁斌自述,民国时期冀中乡村的贫富分化并不特别明显,华北虽有地下党,但没有像南方那样建成根据地。这应该与当时北方农村的特殊社会形势不开,《红旗谱》和《播火记》真实揭示了北方乡村革命的特殊性。

论“青年梁斌”的创作

□刘卫东

两件对梁斌产生了很大震动。梁斌青年时期就不断写作,继而逐步积累,终于在《红旗谱》三部曲中得以完整呈现。佚作《“十一”的话》——献给被忘却的朋友》(《京报》1935年10月5日)中,梁斌隐晦地提到了“二·二九师学潮”中的战斗。“已是三个年不曾听见你提得这件事:那是一个六月的拂晓,敌人拿剃刀和枪炮攻破围墙,来对付青年空军的青年学生”。他的朋友——那斗牛的一群,被严密的军警围在学校里,吃尽了所有的食粮,吃尽了河里的藕,吃尽了看门的狗,把狗抱到县衙门上,向同情者求援。他们未曾有丝毫的‘个人’与‘自私’,是要负起他们的使命”。“关于青年梁斌,文中也提到:“后来敌人要镇压某地的农民暴动,又中给枪毙了四人”。当时,“青年梁斌”就立志用笔写下这一幕作为纪念:“有时几个朋友坐在一起,也想过去纪念朋友们:把他们用文学的笔写出来,并且希望,使它永久的存在世界上”。

此,梁斌1930年代的创作已经得到研究者的关注,出现了多种研究成果。更多时候,研究受到梁斌自我反省的影响,将其看成不成熟的“习作”,而把更多目光投向“红色经典”的代表作《红旗谱》,不可否认,“青年梁斌”正在寻找革命道路,但这时期于五四运动后流亡北平的左翼青年创作的情景,“青年梁斌”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。“青年梁斌”的文学活动,与当时北平左联的领导有很大关系。梁斌在《我们的第一篇小说》中回忆说,他的《夜之交流》(《今》1936年2期)曾通过组织关系,寄给当时中国大学的进步教授梁斌任过,吴承先还提出了阅读意见。另外,与“青年梁斌”的创作相比,梁斌《红旗谱》的语言发生了很大变化。可以说,经过抗战期间“新文艺运动”的战斗生活和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理解,梁斌的语言发生了巨大变化。类似的变化也体现在丁玲、何其芳等许多革命知识分子的写作中,不过因为“青年梁斌”长期被忽视,更为典型的梁斌的语言“转变”,还较少有学者关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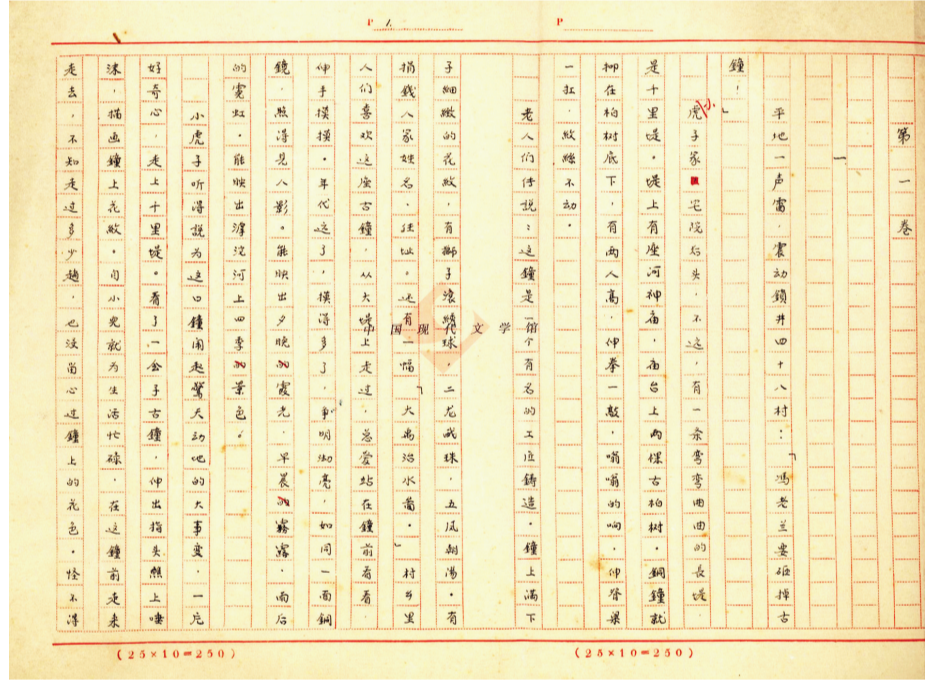
(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、博导)

李三式的飞檐走壁者。至于小说在民族风格探索方面取得的成就,早已成为学界共识,在此无需赘述。

能写出这样不一而足的作品作家,必有其不一样的性格特征与艺术追求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作家写作时普遍有“赶任务”的压力,用创作配合政治政策宣传是其内在驱动力。梁斌也不可能不考虑当时的政治要求与基本规范,但他创作《红旗谱》却是“蓄谋已久”——早在青年时期,在抗战之前,他就以二师学潮为背景写过短篇小说。抗战期间,又多次以中短篇小说以及话剧的形式,写过后来写入《红旗谱》三部曲里的人物和故事,但他创作《红旗谱》是在具有强烈创作冲劲、不写不可的心态下动笔的。为了完成这部作品,他无心当官从政,只想获得更多的创作素材和更好的创作条件。他有明确的精品意识,一心要写出传世之作,而非迎合一时一势。他有强烈的个性追求,不想重复《白毛女》《暴风骤雨》以来写地主农民斗争的老套路,一定要将故事和人物写得与众不同。他对中外文学遗产兼收并蓄,取其所长,探索出独属于自己的“比中国传统写法细一点,比西洋写法粗一点”的雅俗共赏的艺术之境。

熟悉梁斌的人认为梁斌本人性格特别像朱老忠。我认为,《红旗谱》中朱老忠的外形设计就有作者本人的影子:小说原作中的朱老忠,身材并不像影视剧中的扮演者那样魁伟,而是个“小敦实个”,说话声音洪亮,有膛音。而生活当中的梁斌也像他笔下的朱老忠一样,个子不高,但刚毅仗义,敢作敢为。虽然经历过特殊年代的磨难,他的这一性格也不曾改变,除了天赋个性使然,也与其革命老干部的资历和重义气、讲友情的广泛人脉分不开。如此,他才可以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与独立性,坚持自己独特的艺术追求。

(作者系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)



《红旗谱》手稿 中国现代文学馆供图

对人民的忠诚与爱 贯穿生命始终

——我眼中的梁斌 □宋安娜

梁斌出生于1914年,逝世于1996年,享年82岁。他是杰出的人民作家、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、中国当代文学巨匠和著名书画艺术家,梁斌精神和其文学艺术遗产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上世纪80年代,梁斌先生从河北省政协副主席、河北省文联主席任上离休。他是1927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,中共中央正式下达文件,梁斌同志以正部级离岗休养。有关部门征求他的意见,房子、车子、秘书如何安排,他说,一概不要,只要我看病的时候谁个车能送我到医院就行了。

梁斌精神忠诚创作《红旗谱》后,身体一直不好,多次入院治疗。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,晚年几次闹急。1988年,有一天,他参加画家的书画聚会,心脏病突发。老朋友劝他,赶紧向有关部门要汽车,他说,他们太忙,他请人打电话通知他的女儿,用自行车推着他,步行十几里路,将他送到医院急诊。接诊的大夫说,再晚来一会儿就沒救了。家属忍不住后悔,而梁斌从此次病危得到启发,开始着手整理自己的手稿,亲自穿引引线,像乡间小学生做作业本那样,将手稿一本本缝制起来。

梁斌说过,手稿是从作家身上掉下来的肉。一位西班牙收藏者看了梁斌的手稿,找上门来想买(买红旗谱)手稿,送走西班牙收藏者,梁老笑容满面,孩子们问他买什么,他说:“你们猜,开价多少?”孩子们问:“10万人民币。”梁老大笑道:“10万美金!”他将手一摆,说:“10万美金!”梁老突然将全部手稿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。事后,老人家亲口对我说,现代文学馆来人取走时,他特意与自己手稿合影,全部手稿都驮起来,比他的入还高。

梁斌先生最后一次入院治疗是1994年。那一次他住了2年,经天津市总医院的大夫、护士精心治疗和护理,他的病情稳定下来。他叫人在病房里支起画案,重新挥笔作画。梁斌的画作,被誉为红色文人画。他在蠡县小曾接受过正规的美术训练,绘画基础扎实,他的书画创作与他的革命生涯息息相关,北方农村的扁担扁架、白洋淀的落日荷花、太行山的峭峭山崖、武汉江边的清溪风光,都是他百画不厌、推陈出新的绘画题材。他画荷花荷叶,水墨淋漓,“花一叶见白洋淀浩荡云烟;他画枇杷把雨声,果实丰满,枝蔓曼曼缠绕着乡土气息;他的墨山山水更独树一帜,千里太行一派荡荡长风。”

文学家能书画,古来有之,历代都有佳作传世,形成文人画。文人画不拘泥于形似与技法,讲求感情和兴会,捕捉事物最感动自己的特征,抒写胸中最激动自己的感情。但古来文人又多怀才不遇,将满腔不平情绪倾泻于三尺诗笺,所以文人画多古寂寒凉之气。梁斌的画,画的是他的革命生涯,抒发的是他崇高的信仰,他一改古代文人画风,不论诗与画,均大气磅礴,激情满怀,看了令人精神振奋。

梁斌一生创作了8000多幅书画作品,其中3000多幅赠予战友亲朋、普通民众手中。黄胃与梁斌是同族兄弟,黄胃在国画领域伊然大家,两兄弟谈笑之间,梁斌常说:“黄胃不如梁画”;黄胃为《梁斌画选》作序,坦言“梁斌的画和文学创作一样,充满激情和希望。看过他的画的人,都认为散发著新时代表书卷气,表现意象凝重厚积。梁斌说,他的画比诗的画好,就这一点说,我是同意的。”

听说梁斌先生在病房支起画案,慕名来索画的不少,梁老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劳,每有得意之作,也欣然赠送。他在此期间创作了不少精品,但毕竟老矣病且高龄的老人,作画渐渐续续。

1996年4月,梁斌先生连几日不适,体力下降,提起笔来手颤不止,他已坚持不动画笔了。一天清早,他忽然说很想画画,叫人铺开宣纸,一口气画了三个多小时,画出一组四扇屏:梅花、牡丹、枇杷、榴桃。花生盘盎然,果实丰硕繁多,洋溢着生命的蓬勃和收获的喜悦。大家看了,都暗暗称奇,说这哪像一位位老人家的画作,简直就是出自年轻气刚年轻人之手嘛!由此,人们还私下议论,期待始终会战胜病魔,慢慢康复起来,谁也没有想到,两个月之后,他便与世长辞了。

梁斌先生的书法绝笔,是“梁庄小学教学楼”七个字。那是他为家乡河北省蠡县梁庄村的小学题写的匾额。这小学,是他个人捐款50万建起来的,这是一笔“秘密”捐款,全部现金连梁老家人都不知道。那时他还没有退休,老家村党支部带着书记带着学生的家长,来听学校老师的汇报。梁老说,再难不能难了,听说学校有困难,赶紧想办法。于是,置于五四运动后流亡北平的左翼青年创作的情景,“青年梁斌”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。“青年梁斌”的文学活动,与当时北平左联的领导有很大关系。梁斌在《我们的第一篇小说》中回忆说,他的《夜之交流》(《今》1936年2期)曾通过组织关系,寄给当时中国大学的进步教授梁斌任过,吴承先还提出了阅读意见。另外,与“青年梁斌”的创作相比,梁斌《红旗谱》的语言发生了很大变化。可以说,经过抗战期间“新文艺运动”的战斗生活和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理解,梁斌的语言发生了巨大变化。类似的变化也体现在丁玲、何其芳等许多革命知识分子的写作中,不过因为“青年梁斌”长期被忽视,更为典型的梁斌的语言“转变”,还较少有学者关注。

我以对梁老的了解,要想搞到50万元,他只有两个办法:一是找老战友、老同学帮忙,他1927年参加革命,长期在军中工作,战

友、故旧不在少数,其中掌握一定权力的领导也不在少数,他出面为乡村的孩子们说一句话,问题应该不难解决。第二个办法简单,便是自己拿出钱来,但梁斌身边没有这么多钱。几年来,他的生活收入仅够糊口,年轻时不称油打醋,老了更加不称问题,一个没有购买使命的人,要钱何用?但他需要50万元。

大约10年之后,梁斌的家人才对这笔巨款的来历有了片段回忆。原来,有一段时期,家人经常见他携画外出,将他几十年珍藏的名人字画,卷一卷就拿走了。又过了一段时间,家人无意间发现了一张卖画的单据,款项很大,问他,他将手一摆,说:“你们别管,我有用。”家人只知道他在卖画,想做一件自己的事情,就没人再问起,包括教学和用项,这之后就发生了一提包装了50万元现金的事情。

在梁庄,流传著许多梁斌关心家乡百姓的故事。梁喜来患羊角风,四处求医不治,梁斌把他接到天津,请了名医治,回乡后,梁斌一次次去探望,亲自包好药好回去,直至他的病痊愈。3年困难时期,梁斌生活也不宽裕,但他得知梁振家生活困难,让管家缺衣少补,便多次给梁振寄零钱,还给梁管家寄去了棉袄。1988年,梁斌让人将一台电视机和一批图书送到村里,在村办小学开辟了“梁斌”阅览室,鼓励乡亲们读书。

梁斌先生捐出的50万巨款结出了果实,1996年5月,新的梁庄小学竣工了。那是梁庄村最美丽的建筑,两层高的教学楼坐北朝南,楼体向东西两侧展开,恰似一个正张着双臂拥抱的山峦,在阳光下尽情地向开他的双臂。教学楼的中部设置了一座弧形过厅,采光充分,厅堂阳光灿烂,灿烂的光芒将琅琅读书声变成出洞般激昂的颂歌。

此时,梁斌先生已经在住院并两次病危又转危;黄胃为《梁斌画选》作序,坦言“梁斌的画和文学创作一样,充满激情和希望。看过他的画的人,都认为散发著新时代表书卷气,表现意象凝重厚积。梁斌说,他的画比诗的画好,就这一点说,我是同意的。”

听说梁斌先生在病房支起画案,慕名来索画的不少,梁老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劳,每有得意之作,也欣然赠送。他在此期间创作了不少精品,但毕竟老矣病且高龄的老人,作画渐渐续续。

1996年4月,梁斌先生连几日不适,体力下降,提起笔来手颤不止,他已坚持不动画笔了。一天清早,他忽然说很想画画,叫人铺开宣纸,一口气画了三个多小时,画出一组四扇屏:梅花、牡丹、枇杷、榴桃。花生盘盎然,果实丰硕繁多,洋溢着生命的蓬勃和收获的喜悦。大家看了,都暗暗称奇,说这哪像一位位老人家的画作,简直就是出自年轻气刚年轻人之手嘛!由此,人们还私下议论,期待始终会战胜病魔,慢慢康复起来,谁也没有想到,两个月之后,他便与世长辞了。

梁斌先生的书法绝笔,是“梁庄小学教学楼”七个字。那是他为家乡河北省蠡县梁庄村的

小学题写的匾额。这小学,是他个人捐款50万建起来的,这是一笔“秘密”捐款,全部现金连梁老家人都不知道。那时他还没有退休,老家村党支部带着书记带着学生的家长,来听学校老师的汇报。梁老说,再难不能难了,听说学校有困难,赶紧想办法。于是,置于五四运动后流亡北平的左翼青年创作的情景,“青年梁斌”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。“青年梁斌”的文学活动,与当时北平左联的领导有很大关系。梁斌在《我们的第一篇小说》中回忆说,他的《夜之交流》(《今》1936年2期)曾通过组织关系,寄给当时中国大学的进步教授梁斌任过,吴承先还提出了阅读意见。另外,与“青年梁斌”的创作相比,梁斌《红旗谱》的语言发生了很大变化。可以说,经过抗战期间“新文艺运动”的战斗生活和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理解,梁斌的语言发生了巨大变化。类似的变化也体现在丁玲、何其芳等许多革命知识分子的写作中,不过因为“青年梁斌”长期被忽视,更为典型的梁斌的语言“转变”,还较少有学者关注。

我以对梁老的了解,要想搞到50万元,他只有两个办法:一是找老战友、老同学帮忙,他1927年参加革命,长期在军中工作,战